

如何破解治污染中的“联动混乱”

沈建华

今日论语

昨天人民日报报道：“重污染天气应急，多地出现部门间联动混乱。”其中“南京市教育局发布中小学停课应急措施，当地环保部门并不知情；天津市环保局发布机动车限行措施，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却不买账”，对这些行政混乱，记者认为“折射出应急预案缺乏必要的权威性和对预案执行监督力度不够”。

治理污染中的“联动混乱”，除了预案缺乏权威性和监督力度不够，恐怕还有更重要的原因。

这一系列应对措施都是在去年一年各地雾霾高发，在中央和各省市政府以及公众、舆论巨大压力

下匆匆出台的，加上目前对于雾霾发生发展的科学机制、机理的了解总体上仍非常有限，拿出的方案粗糙，这应该还是可以谅解的。但理解或者谅解的前提，是有关部门的确花了功夫，设计方案尽了全力。前几年我有机会看到过几个管理部门应对城市安全公共危机管理的预案，大多只有单面一两张打印件。记者报道治污“38个城市的预案，面孔却十分‘单调’，感觉都像一个模子出来的”。这些预案中，有没有我碰到过的那样的“浆糊”预案？虽然非常希望没有，但实在不能说一定不会有。

整个事件中各个部门之间的“脱头落掌”和“联动混乱”现象，值得研究。我们公共管理部门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部门多，分工细，“铁路

警察各管一段”，各部门职能交叉，甚至可能有部门利益冲突。部门之间，尤其是“连接部”地带，行政作为“越位”和“缺位”同样存在，表现为严重的政府行为“碎片化”。在食品公共安全管理上被广为诟病的“三项、四项大盖帽管不了一顶破草帽”“18个公章管不了一头猪”就是行政“碎片化”的写照。

对此，长期以来的应对办法，是成立由中央或地方行政部门主要负责人挂帅的各式各样的超级协调委员会，例如食安办。眼下不是又见有两会代表委员提议成立由总理兼任的超级环保委员会吗？甚至还有有人提议成立“雾霾办”统一协调各政府部门的工作。有时这种超级“委员会”或“办公室”是有用的，然而任何重要一点

的公共管理行为，如果涉及多个政府部门，都要建立一个超级协调委员会或者超级政府部门，这有长效吗？这也正是各地党委和政府机构中总可以发现五花八门的序列外机构，如各种“办公室”或“委员会”的原故，一次又一次清理，总也理不清楚。

关键是思路，路子没有校过来，行政行为碎片化的问题就会以不同形式不断冒头。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并且“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优化政府组织结构，提高科学管理水平。”如何解决问题，看来还要寄望于深化改革，只有切实按照全会公报的精神，才有望让这类“部门联动混乱”得到解决。

新民随笔

“打车神器”与“公正问题”

邵宁

昨日中午打的，看到车上放了一个智能手机，不断地传出“某地某人要车”的语音信息，随口问的哥：这个打车软件你用得多吗？不料，引出了他的一大段话。

“多的，最近特别多。这家公司现在推出了活动，鼓励用支付宝付车费，每次奖励乘客10元，也就是说，你用‘某某打车’叫到车后，14元车费，自己只要付4元。同时，一差业务奖励驾驶员15元，每天最多奖励5次，75元。我今天已经做了六七差了，奖励封顶了。另外每天还有5元流量费补贴。用支付宝也很方便的，钱到我的支付宝账户后，马上就转到银行卡上。乘客有没有加价？最近比较少，因为正月十五还没到，很多人还没回来。对了，你装了没有？我推荐你装，可以拿10元奖励。”

动动手指，的哥得益，乘客开心，打车软件真可谓是“两面讨好”的神器。然而，就在“打车神器”所向披靡之际，有些人却笑不出来，就是那些不用智能手机或没有下载打车软件的乘客。他们眼睁睁地看着一辆辆亮着“空车”小灯的出租车从面前驶过。他们中，有很多是最需要乘车的老年人，他们可能永远学不会使用“某某打车”。今年的“春节前打车难”因此加剧，也成为媒体争相报道的焦点。为此，政府部门和出租车公司也在绞尽脑汁想对策。孰料，对策还未想好，打车软件又得到了支付宝这一网上支付利器的助力，正在抢占更大的市场。

打车软件的出现，对于所有的乘客究竟是否公平？加价叫车到底是一种合理的奖励行为，还是一种扰乱市场的行为？如果一种新技术，在使一部分人得到便利和实惠的同时，损害了另一部分人的利益，这种技术是否应该推广？

公平正义，永远是人类社会追求的目标。哈佛教授迈克尔·桑德在《公正，该如何做是好》一书中，对诸多涉及经济、社会、法律、道德、伦理的“公正问题”，进行了质问、思考和辩论。打车软件带来的疑问，也是一个类似的案例，值得进行深入的思考、探讨。

高科技是一柄双刃剑，如何将其正面优势最大化，而将不利因素降到最低，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永恒的课题。

扶起人心，需要乐观的现实主义

权威声音

一方说被撞、一方说被讹，法院使用测谎仪当“判官”；交警扶起老人，第一句话被问“小伙子你怎么撞我”；肇事者撞完人逃跑，“奔驰大叔”先拍照取证再施以援手……马年新春，几起很有代表性的“扶人”新闻又摆到我们面前，相比观看春晚小品的会心一笑，现实更令人五味杂陈。

事实上，大众对“扶不扶”的强烈关注，背后投射的，正是向善

者在现实困境中的纠结，对社会转型期良好道德风尚的迫切期待。当利益考量与道德选择迎头撞上，江苏泰兴的“奔驰大叔”先取证再救人，类似这样的选择，体现出一种乐观的现实主义精神。在行善风险客观存在、制度和规则对善行的保护一时还难尽如人意的情况下，他们没有怨天尤人，没有踟躇退缩，始终充满信心，并用自己的行为，守护住了心中善的冲动。

“人倒了扶得起，人心倒了扶不起”。讨论这个朴素的道德话

题，离不开复杂的时代语境，更与我们的自身处境息息相关。“奔驰大叔”这些乐观的现实主义者，尽管没有舍生取义的毅然决然，没有赴汤蹈火的豪言壮语，但他们比一万个在网络痛斥老人变坏、坏人变老却在现实中无所作为的空谈家更可贵。我们应该向他们致以真诚的敬意和谢意，因为正是这些乐观者、行动者，为现实中那些并不那么纯粹的人们树立了一个样板，而这样的样板，人人可学，人人可为。（曹鹏程 刊今日《人民日报》本报有删节）

新民新语

老宝贝儿

易蓉

秀兰·邓波儿去世了，享年85岁。她的经纪人发表声明，向全世界发布这一悲伤的消息：“她的一生作为演员、外交官、妈妈、祖母、曾祖母都成就卓著，我们向她致敬。”在美国加利福尼亚的家中，她去世时全家陪伴。正如经纪人所说，她的一生，各种角色她都一一胜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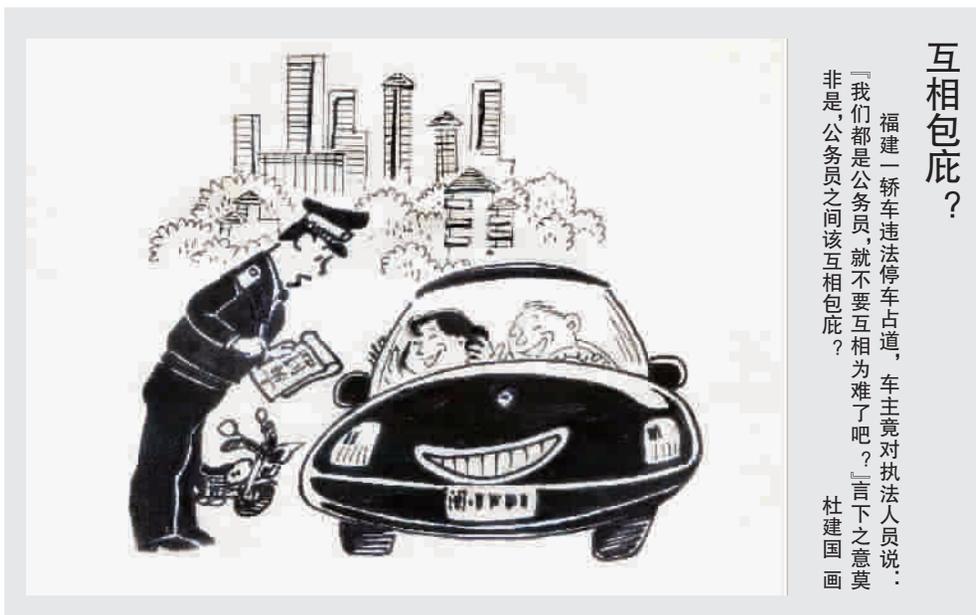
人生不是录像机，没有后退、暂停或快进。银幕定格小卷毛的可爱，但现实无法阻挡邓波儿的成长。明星如此，凡人亦如此。谁不曾是母亲襁褓中嗷嗷待哺的婴儿，谁没有咿呀学语的可爱，谁不会经历激动叛逆的青春，谁又能阻挡岁月这把杀猪刀？

卡梅隆·迪亚兹主演的一部《偷穿高跟鞋》是一部家庭伦理喜剧。迪亚兹扮演一个胸大无脑的无知美女，来到外婆艾拉在佛罗里达居住的老人社区。在这里，大美女招摇过市，天天比基尼游泳，炫耀青春靓丽的脸庞，身边一个个慢吞吞皱巴巴的老头老太。然而，正是在这个节奏缓慢、居民单纯的老年社区，游手好闲的无知美女终于找到人生信念，洗心革面统一了外在美和内在美。

谁说只有年轻人有魅力？17位平均年龄81岁的阿公阿婆，花了13天骑欧兜迈（闽南语：摩托车）环台湾，旅行被拍成纪录片《不老骑士》，感动很多人。何老伯把老婆的遗照挂在车头，遇到阵雨暂停还仔细擦去照片上的水珠；每位老人都有关节退化的毛病，2位患癌、4位戴助听器、5位高血压、8位心脏病，工作人员说，如果按照体检合格的标准，基本没有一人能成行。

每年一次，过年回家看望老人。爷爷拉着我叨叨报道里安倍晋三的童年影响了现在的倾向，叨叨着自己的身体，叨叨起那些事这些那些，中间常常想不起一些人或事。爸爸说，想买一台操作简单录音机给奶奶，方便她录下一切想要记录的记忆。这两年常常很害怕他们的老去，惶恐无力陪伴，深怕他们远去。

家家的老人都是宝，他们见证和经历了大半世纪的变迁，即便有点毛病有点脾气，也值得像孩子一般爱护。虽然无力解决时空限制的现实，但在有限的相处时，或许我们都应该像电影里的卡梅隆，调换一个慢节奏的频道，耐心去陪伴发现老宝贝儿们身上的珍贵。



自由谭

春节期间走亲访友探望老人，老人们对生活很是满意，特别是今年每月又涨了几百元的工资，日子越来越好了。但也不免为了“一日三餐”的事犯愁，此事使我想起了几时的“居民食堂”。

50年前，笔者住在广东路一带，“居民食堂”位于昌兴里弄堂深处的厢房内。食堂的外墙上画了一幅很大的画：戴厨师帽的师傅，一只手握着铲子，另一只手捧着一盆大蹄膀，让人垂涎三尺；食堂的房间由两大一小，外加一个天井组成，约一百来平米，可分批容纳一百多人用餐；吃饭的桌椅是白木做的八仙桌、长条桌和长板凳；碗、盆子、勺子全是搪瓷的，筷子是竹头的；房间的灯是旧

“居民食堂”的感悟

谢京辉

式的黄色拉线灯泡。在食堂工作的阿姨们说起来也是当时的“新上海人”了，开饭时苏北话、宁波话，南腔北调，别有一番风味，她们穿着白色大褂、手臂套上一副袖套。这些阿姨是被居委会组织起来的一些家庭妇女，服务态度绝对地好，热心、热情，嗓门大，动作麻利，收入虽不高，但可以补贴家用。食堂每天7点半供应早餐，中午11点供应午餐，下午5点半供应晚餐，7点半打烊。“居民食堂”主要供应里弄加工厂工作的叔叔阿姨们，捎带上附近居民，在食堂吃饭需要每月交上几元钱的搭伙费；食堂的菜单是块

小黑板，挂在卖菜窗口边上，上面写着“青菜大排1毛5，草头圈子1毛3，红烧小黄鱼1毛2，干煎带鱼1毛，炒青菜5分钱，番茄冬瓜汤5分钱……”早饭是几分钱的稀饭、馒头、豆浆等家常便饭，晚上吃饭人相对较少，菜的品种也简单。平时吃饭高峰在中午11点半，也就二十来人的小队伍，一边排队一边闻着扑鼻而来的菜肴香味，现在想起来也真叫一个美啊！再吃上一盆炒猪肝，能让人幸福上好几天……

半个世纪过去了，与老人聊起当年食堂趣事，他们难以平静，仿佛沉浸在幸福中。现在他们虽能安享

晚年，却常会为明日的“一日三餐”犯愁。尤其是过年，钟点工阿姨回家了，“买、汰、烧”，爬楼梯，对上了年岁的人已是力不从心，何况子女不在身边，这“一日三餐”成了大事体。尽管有关部门在积极解决老人的困难，办起了托老所、老龄送餐服务，但有严格的年龄限制，菜的质量还有待提高。习总书记指出“人民的向往就是奋斗的目标”，有关部门在研究有关养老政策配套时，能否优先考虑解决这“一日三餐”的问题。

当年所处计划经济年代，物资相对匮乏，办“居民食堂”难处肯定不小，还是依靠组织的力量解决了这个困难。现在办类似的社区“居民食堂”也会面临很多问题，但上海已步入老龄社会，早日谋划启动这项计划，将会是老人们的福音。（作者为上海社科院副院长、高级经济师）